以族源神话研究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心相通

——评李斯颖《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研究》

□梁庭望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斯颖的新作《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研究》聚焦于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瑰丽多彩的族源神话，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广博详尽的文献搜集，系统剖析了这些神话的渊源、演变轨迹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作者的此项研究，不仅填补了该学术领域的空白，更如同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侗台语族悠久历史、独特文化与深邃信仰体系的大门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。这一研究对促进“一带一路”文化交流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有着重要意义。

侗台语民族起源于华南地区，又有“百越”之称。《汉书》记载，“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，百越杂处，各有种姓”。可见，百越虽然已有“种姓”之别，文化各有生发，但文化内部的共性依然鲜明，彼此之间的往来、联络密切。我曾经在以往的文章中证明并强调过，百越民族是最早进行人工栽培水稻伟大发明的族群之一，稻米养活了世界上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，其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可见一斑。百越先民的文化特质还包括纹身、舟楫、干栏房、凿齿、织布等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持续而独特的贡献。为了种植水稻、安居乐业，百越先民不断沿水路迁徙，发展成为如今分布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老挝、越南、泰国等国家的多个民族，并根据语言学上的划分被统称为“侗台语民族”。这些民族，虽然生活的国度不同，但依然顽强地使用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，以多种方式维系着自身的文化传统，努力地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求新的发展，令人钦佩。我曾到泰国访问，用家乡的壮语与泰国人交谈，依然能够实现日常问题的交流。可见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壮族的语言文化与泰、佬等国语言文化中的相似或相通之处，是推动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多国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。对侗台语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，将会为我们今日探索百越文化、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、助力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全面合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思路。李斯颖的《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研究》就是这样一部符合时代呼唤、可增强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佳作。

作者在十余年间完成了对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活态神话材料的调查、搜集与整理，用于研究的基础材料丰富而鲜活。作者从布洛陀神话调查出发，将观察视野扩大到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的族源神话。她不但在国内壮、布依、傣等民族地区开展了长期深入的调查，还在东南亚的泰国、老挝等国家的民族地区完成了高质量、大范围的田野调查，十分难能可贵。正是通过锲而不舍的田野调查与访谈等方式，作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文字资料、图片资料和影像资料，对相关族源神话的地域分布、主要内容、民族文化特点和传承现状有了全面了解。与此同时，作者搜集了较为全面的多民族多语种的神话文本和研究成果，使得其研究创新更为扎实。作者广泛查阅和搜集了与侗台语民族台语支族源神话相关的、多语种的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，这其中既有英文、法文以及东南亚泰文、老挝文、越南文等多国文字的相关材料与研究成果，涉猎广泛而齐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其中还有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以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各类神话材料，包括艺人在仪式上使用的手抄本、贝叶经、民间流传的各种介绍材料等。这为研究提供了兼具历时与共时性的深度与广度，建立了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库，完成了对国内外相关学术史的观照与总体把握。

《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研究》立足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这一框架，注重发现不同民族族源神话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相互呼应。与此同时，作者突破了神话学的领域，运用了语言学、分子人类学、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观点，完成了对台语支族源神话全新的整体考察，得出了令人振奋的新观点和新结论。全书在对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，充分关注到了其内部的共性与相互呼应的特点，即以“Mo”信仰为统领、祖先与天体（日月）并行及融合等较为常见的模式。总的来看，书中的系列观点突破以往学术研究的局限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侗台语族台语支族源神话虽然有共同的渊源，但流传到不同国家，必受该国文化的强大涵化，故此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族源神话叙事。例如，同样是侗台语民族的水神崇拜，到泰国就发生很大变化，但又不全变。我曾为此在1994年作七律《曼古佛寺》一首，讲的就是这个文化融合的现象：

曼谷佛寺真辉煌，
九首那卡守殿堂。
那卡盘身当佛座，
多首佛背扇形张。
印度神蛇融蛟龙，
蛇蛟融合变模样。
文化交流相印证，
蛟龙首数有名堂。

总的来看，《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族源神话研究》一书篇章设置新颖，结构合理。章节名称凝练，学术视野开阔，研究视角独特。书稿内容丰富，既有宏观视角上的理论提升，又有对个案的细致深入考察，观点创新性较强。著作展现了作者执着的学术追求和扎实的专业素养，令人欣喜。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联系的进一步紧密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良好推进势头中，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脚踏实地，为彼此的民心相通做出更多的努力。

（作者系壮族著名文化学者，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）

马山县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漫谈兼与汉语称谓比较

□蓝明生

亲属称谓，即对亲属的称呼，或具有亲属关系者的互称，亲属称谓系统包括宗亲、外亲和妻亲，亲属称谓根据辈分、宗族、年纪与性别有所不同。壮族地区各壮语方言的亲属称谓大同小异，它们在保留自身独特性的同时，也受到了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。壮族的亲属称谓反映了壮族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、性别与代际差异以及文化身份的认同，揭示了壮族社会在维护家族关系、传承文化规范和保持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周密的亲属关系网络，反映了壮族地区社会对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视和尊重。壮语亲属称谓不仅体现了壮族独特的家族观念和社会结构，还反映了壮族与汉族在长期历史交流中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。本文拟从马山县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出发，分析其特点，并与汉语的亲属称谓作相应的比较,更深入地理解壮族文化在吸收汉族文化元素的同时，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，从而揭示壮汉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、共同发展的深层脉络。

一

百龙滩镇地处马山县北部，东、北接都安瑶族自治县龙湾乡，南连白山镇，西邻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，全镇90%以上为壮族人口，基本上操壮语（壮语北部方言蛮话）。

当地人对亲属的称谓，可从下面的称谓简图大致反映出来：

（注：该图为以男性“己”为中心对亲属主要成员的称谓简图，若“己”为女性，对上下各代的称谓与男性完全相同）

二

从称谓简图的壮汉亲属主要成员称谓对照可看出：

（一）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以实人为主，代际简单，上下祖宗仅八代：上代为boh(父)、goeng'oiq（祖父）、goenggeq（曾祖父）、goengcoj（高祖父），下代为lwg(子)、lan(孙)、laenj（曾孙）、leq(玄孙)。而汉语亲属称谓兼顾实人、逝人和后人，代际久远，上下祖宗共十八代：上代为父、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、天祖父、烈祖父、太祖父、远祖父、鼻祖父，下代为子、孙、曾孙、玄孙、来孙、晜孙、仍孙、云孙、耳孙。

（二）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较笼统，如：兄与内兄都叫go，弟和内弟、妹和内妹都叫nuengx，姐和内姐都叫cej，孙和外孙都叫lan；父母的兄长都叫lungz，父母的姐姐都叫baj，夫妻的爸都叫boh，夫妻的妈都叫meh。而汉语亲属称谓更具体，如：兄与内兄、弟和内弟、妹和内妹、父母的兄弟姐妹等都能区别开来。

（三）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中对个别血亲的称谓较具体，如：父之姐为baj，父之妹为gux，母之兄为lungz，母之弟为nax，母之姐为baj，母之妹为nax，祖父之姐为yahbaj、祖父之妹为yahgux；而汉语对这些亲属称谓较笼统，即父之姐妹为姑，母之兄弟为舅，母之姐妹为姨。

（四）随着壮汉民族交往交流的加深，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受汉语影响越来越大，有些直接借用，如：哥为go，姑为gux，祖父（公）为goeng，姐为cej；有些则慢慢汉化，如：叔由au变cuh，女婿（姑爷）由lwgguiz变goyez，父亲（爸）由boh变aebaq，母亲（妈）由meh变bazmaq。另外，所有表亲都带“biuj”，如：gobiuj（表哥），cejbiuj（表姐），bohbiuj（父之表兄弟），mehbiuj（母之表姐妹）。

三

几点思考：

（一）民族文字对民族语称谓的影响。任何文字都是某一语言的可见形式，它能使某一语言被记录、传承和共享。壮族有本民族的语言——壮语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壮族没有统一的本民族文字，仿照“六书”造字法、在民间流传近千年的方块壮字仅在特定的领域“内部”使用，它在积累知识、传承民族文化、促进思维发展、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有限。汉语亲属称谓有十八代祖宗，而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仅有八代祖宗，存在体系不够完善、称谓容易混淆的问题，除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外，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上没有统一的本民族文字，使得亲属称谓仅靠口口相传，出现了信息失真与丢失、传播范围有限、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等问题。

（二）汉语对民族语称谓的影响。汉语在记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促进各民族团结交流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汉语对民族语亲属称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称谓的借用和融合上。如以上所述的百龙滩镇壮语亲属称谓中的哥（go）、姑（gux）、祖父（goeng）、姐（cej）等就直接借用了汉语的亲属称谓；而叔由au变cuh、女婿（姑爷）由lwgguiz变goyez、父亲（爸）由boh变aebaq、母亲（妈）由meh变bazmaq等则体现了汉壮语亲属称谓间的相互融合。

（三）壮语亲属称谓的发展趋势。汉语的亲属称谓在系别特征、血缘特征、长幼序列等方面逐步走向简化，在拟亲属方面却存在泛化的趋势。随着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得到贯彻落实，我国56个民族团结得更加紧密了。汉语普通话在壮族地区的推广和影响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和实践，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，加快了民族间融合的步伐，但民族语亲属称谓仍保留有自身的特点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壮语各方言区内仍然存在着各自的亲属称谓体系，只是这种亲属称谓体系在与汉语亲属称谓体系不断融合发展的同时，自身也在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。壮语中“daeggoh(阿哥)”“dazmei(阿妹)”“ahbah(阿爸)”“ahmah(阿妈)”“ahcuz(阿叔)”“ahgiu(阿舅)”“ahyiz(阿姨)”“denhcuj(天祖)”“lezcuj(烈祖)”“laizsunh(来孙)”“gunhsunh(晜孙)”等词汇的出现，不仅反映了壮汉语言间的相互影响，也体现了壮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和和谐发展。

（作者系广西壮文学校图书馆研究馆员）